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1.025

引用辞格审美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因^①

宗廷虎, 李金苓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引用辞格在我国之所以能有数千年的发展史, 并且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是与其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色有关。各历史阶段中, 引用辞格审美的发展又与社会文化动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总体说, 大致可以从7个方面进行探索, 即: 社会需要的制约, 崇古、尊圣观念的影响, 礼义等哲学观念的渗透, 文坛主流思潮及风尚的制约, 社会习俗文化的促进, 文体发展的推动及古今引用理论的推进等。

关键词: 引用辞格; 审美; 社会文化动因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5)01-0131-06

On Social Culture's Motive of Rhetoric Citation's Aesthetic Development

ZONG Ting-hu & LI Jin-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Having had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rhetoric citation has enjoyed the popularity of the public in China, the reason for which might have been related to its distinctive aesthetic features. During every historic stage, rhetoric citation's aesthetic development has had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motive of social culture. Generally speaking, it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following seven aspects, i. e. the restrictions of social needs, the influences of worshipping the ancient classics and esteem for the Saints, the infiltration of rituals, the philosophic concepts,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main trends of thought and prevailing customs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customs and culture, the drive of stylistic development and the boost of the citation theories in the history.

Key words: rhetoric citation; aesthetic; motive of social culture

引用辞格作为一种常用的修辞现象,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运用史,古往今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陈望道对“引用”的定义是:“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成分,名叫‘引用辞’。”^{[1]103}这里所谓的“成语”与“故事”约指“言谈、成说”与“事迹、典故”。而“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可理解为“引言”与“引事”。这种“引言”与“引事”,便是引用辞。

引用辞格之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的青睐,与其具有鲜明的审美特点有关。各个历史时期除了分别呈现起主导作用的庄严美、典雅美、通俗明晰美之外,还有交替呈现的多元美作陪衬,如含蓄美、简洁美、变化美、诙谐美、精切美等。引用辞格审美数千年的发展史证明:它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生存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之中,植根于社会政治、文化土壤深处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积淀的产物。因为首先,作为被引用资源的“言”和“事”其自身就是人们创造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结晶。其次,人们在长期的引用过程中,对被引用资源的“言”和“事”的意义、内涵、色彩等,或沿用、或削减、或拓展、或改

① 收稿日期:2014-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by067)

作者简介:宗廷虎(1933-),男,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修辞学研究。

变,亦即通过不断增减、变换新的文化元素,从而愈益显示出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可以说,引用是一种古与今、新与旧、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修辞现象。从文学修辞批评历史过程来审视引用^[2],引用审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承文化与发展文化的过程。故而它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本文试对二者的关系,从不同视角作初步探索。

1 社会需要的制约

引用修辞审美的发展与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需要,二是各条不同战线的需要。

1.1 不同阶层人士的需要

先看统治阶层的需要。我国古往今来有识之士曾总结过,历代统治阶层为了统一天下民众的思想,而频频引用“古训”的历史经验。近代著名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注意到“古训之用”,指出:“道古语以割今,道之属也。取古事以托喻,兴之属也。意皆相类,不必语出于我,事苟可信,不必义起乎今。……若夫文之以喻人也,征于旧则易为信,举彼所知则易为从。故帝舜观古象,太甲称先民,盘庚念古后之闻,箕子本在昔之谊。周公告商而陈册典,穆王详刑而求古训。此则征言征事,已存于《左》《史》之文。凡若此者,所以为信也。”^{[3]97}黄氏以上虽仅以先秦时多位帝王、重臣对此的认识为例,但已揭示了我国历代统治阶层的共识:用典,对统一认识、深化统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南北朝,几代帝王爱好文学,不仅提倡用典隶事,还带头身体力行,对文坛数典隶事之风的盛行,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用典,对统治阶层来说,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思想统治的手段,因而历代的统治者无不重视与运用。

再看知识分子与平民的需要。以先秦为例,“士”游说诸侯时,为了使所奉献的富国强兵之策能被采纳而经常引经据典。诸子百家参与学术争鸣时,引用是常用的手法之一。再以两汉为例,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指出:“贾谊《鹏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及杨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至于崔(駟)、班(固)、张(衡)、蔡(邕),遂摭摭经史……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补充说:“爰至齐梁,……用事采言,尤关能事。”黄氏接着分析:为什么“文章之功,莫切于事类”,为什么大家热衷于用典呢?已与多年形成的理念与习俗有关:“学旧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逃孤陋之讥,自为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免空虚之消。”^{[3]97-98}这个理念与习俗一直影响到现代,即使人民大众日常交际,也常引用权威的话或俗语以加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1.2 各条战线的需要

古往今来,引用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活动的各条战线几乎都需要“引用”为之出力,因而其引用审美也具有多方面的魅力。以外交战线的需要为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相互聘问,外交活动频繁。在外交场合,宾主常赋诗言志,通过引用《诗经》的诗句来传情达意,暗示各自的政治意图,从而达到外交的目的。《左传》对此有较多记载。所以孔子也指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现当代国际之间的外交活动更为频繁,我国领导人访问外国时,经常在对方的欢迎大会上引用所在国的名人名言或其俗语,从而拉近感情,增强亲和力。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举例说:“有一天,胡耀邦同志谈到,同外国人讨论问题可引用一些外国名言,来提高我们的说理性、逻辑性和感染力。……最后我们编了一本外国名人名言小册子。访问期间,胡耀邦同志真用了其中一些话,效果非常好。”^[4]其他战线,如工业、农业、教育甚至进行学术研讨等亦无不需要引用发挥作用,不赘述。

2 民族文化心理:崇古、尊圣观念的影响

引用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之所以历数千年依旧生命力旺盛,还与民族文化心理中崇古、尊圣观念的强烈密切相关。人类历史幼年固然一般均有图腾崇拜时期,我国这方面的历史遗迹更打上了特殊的印记。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三皇五帝传说的版本不一,但三皇五帝都是被崇拜的对象。儒家创始人孔丘,作为崇古、崇周代文化、崇拜尧舜等圣贤的代表,他赞扬尧舜的话,如“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经典而引用。不仅对圣贤如此,而且唯“先王”的语言为宗,也成为读书人的一种自觉意识。《荀子·非相篇》即宣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大盛,崇古、尊经思想也有

了发展。例如,扬雄一再宣称:“圣人之言,天也。”(杨雄《法言·五百》)孔子的“书、言、行、天也。”(杨雄《法言·君子》)将孔子等圣人的话视为永恒的道德规范。扬雄认为:读书不宗《五经》,“非书也”;言语不宗《五经》,“非言也”(杨雄《法言·问神》)。这种认识,对当时“征圣”“宗经”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此,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总结说:用典“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这一论断,准确而到位地揭示了“尊圣”观念对引用的重要制约作用。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高举复古明道的旗帜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韩愈《答刘正夫书》)宋代复古运动的骁将欧阳修同样认为:“《诗》《书》《易》《春秋》等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欧阳修《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可见崇古尊圣思想,一脉相传。明代虽有主张复古,拟古与反对复古、泥古之争,但对《书》《诗》等经书,也是奉为征引典籍的。清代不少学者主张学古而不泥古,并能“通变”。到了现当代,崇古、尊圣思想演变为对权威的崇拜。人们在论辩、演说或撰写学术论文中,常常引用权威的观点作为增强说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受上述思想影响的表现。崇古、尊圣、崇拜权威理念指导下出现的引用,主要呈现庄严美,有时也呈现典雅美。

3 礼义等哲学思想的渗透

早在战国时代,礼、义等哲学思想已深入渗透到《诗经》的引用中。多方面引《诗》,是战国时期一种特有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引诗、论诗的最终目的已在于‘以诗证礼’或‘以诗明礼’”^{[5]306},这时的《诗经》,不仅仅被视为文学,它已“广泛应用于宗教、哲学、政治、外交、教育等诸多方面”^{[5]58}。仅以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献《礼记》引用《诗经》为例,用诗139次中,几乎都与“礼”有关。据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对《礼记》引用《诗经》的分析:“其一,用《诗》的目的是为了对礼作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从而证明礼的重要性……其二,这种用《诗》形式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的态势和说教者的口吻,听说双方事实上均已把《诗》当成了心目中的权威和经典;其三,‘诗云’多数情况下又是借孔子之口以‘子曰’的形式出现,进一步渲染了用《诗》的效果,增加了用《诗》的权威性。这样,通过《诗》证明了礼,在礼的原则下,又通过礼阐释了《诗》。礼的权威地位重新得以确立,儒家以礼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同时,儒家以礼为首要标准的经世致用的诗学理论体系也开始形成。”^{[5]64}《诗经》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经典,它闪烁着“礼”的光芒,保存着先祖的仪型,蕴含着历史和人生的启示。因此对《诗经》的引用以庄严美为主,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到了汉末以后,道、玄、佛的地位大大提升。魏晋之际,玄学成为主流,自东晋至南朝,佛学又一跃而成为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引用中的审美,在哲学思想的制导下,也转而以为典雅美为主了。

4 文坛主流思潮及风尚的制动

历代文坛上出现的主流思潮或风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不仅影响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各种文体中引用审美的发展也有制约作用。辞格审美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很好的证明。例如魏晋南北朝的文坛上曾出现以“数典用事为工”风尚。文人们聚会时常相互“用事”以显示才能,甚至以“用事”作比赛。尚书令王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卢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座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南史·王摛传》)王摛之所以趾高气扬地离去,乃因他在“用事”比赛中夺冠的缘故。由此可见,这种视“用事”多寡为美、以炫耀知识广博为美的风尚有力地推动了引用审美的发展。小说、诗歌,尤其是骈文中的引用均有所表现。再如宋代文坛上崇尚创新的风气甚盛,不仅诗文创作强调创新,而且“用事”手法的运用亦强调创新。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中指出,宋型文化具有“不唯经”“不唯圣”的特点:“宋代的疑古批判精神造就了‘经学变古时代’。……怀疑精神……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精神,开放心态。”^{[6]20,22}这种“创造精神”影响了诗坛重视引用手法理论的探索。如王安石提出“借事以相发明”说,苏轼提出用事“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说,黄庭坚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范晞文提出“临时翰旋”法,严有翼、杨万里等人提出“反用法”“翻案法”等。他们同时身体力行,带头创新实践,于是诗坛上形成崇新尚奇的风气。这种创新的风气促使了宋代引用方式的创新,如化用的多样与反用的大量出现。这种创新的风气也影响了引用审美的多姿多彩,除典雅美外,新颖美、变化美等均引人注目。

5 引用审美融化成社会习俗文化的多个方面并相互促进

千百年来,引用手法用途广泛,已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并已融化为社会习俗文化。人们通过用典给多类事物命名,从命名中可以看出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以下仅以人名(含绰号)、建筑物名、校名、书斋名、书名等为例。

先看人名。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记载:晋代庾亮给刘爰起了个绰号:“羊公鹤”。接下来该文解释道:“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氍毹而不肯舞,故称比之。”西晋大臣羊祜(字叔子)有一只会跳舞的鹤,即向人夸耀。鹤被赶来后,却松松垮垮地不跳。庾亮用此典比称刘爰像“羊公鹤”一样名不副实。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名字典出《易经·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唐代茶圣陆羽,字鸿渐,也典出《易经·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宋代词人周邦彦,其名典出《诗经·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兮。”“邦彦”者,国家之栋梁也。元曲名家马致远名字典出《淮南子》:“非宁静无以致远。”现当代多位名家的名字也多有出典。如张闻天名,出自《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朱自清名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谢冰心名出自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一片冰心在玉壶。”刘白羽名出自卢纶诗《和张仆射塞下曲》:“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美学家蒋孔阳名出自《诗经·豳风·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以上人名,或寄托了父母的期望,或蕴含了本人的决心,有的典出经籍,有的引自诗词名句,它们又与题意情境高度切合,分别呈现了庄严美、典雅美、含蓄美或精切美。

再看故宫众殿名。北京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明、清两代。众殿名中,太和殿名典出《易经·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周振甫《周易译注》:“大和:太和。”中和殿之名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殿名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交泰殿名典出《易经·泰》:“《象》曰:天地交泰。”象征帝、后和谐,安康美满。养心殿名出自《孟子》:“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意为要涵养天性。以上殿名均出自经典典籍,呈现了庄严美。

再看校名。复旦大学的“复旦”典出《尚书大传·虞夏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郑玄注:“言明明相代。”“旦复旦”谓光明又复光明。同济大学的校名引自《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济”比喻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再看书斋名和专书名: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自称,其书斋取名“照隅室”,其文论集取名“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照隅”二字典出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系“用来对照自己的治学方法”(《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自序》)。另一复旦教授王欣夫以“蛾术轩”为自己书斋名,典出《礼记·乐记》:“蛾子时术之”,意谓要学大蚂蚁勤衔泥以成蚁冢,比喻勤学。王欣夫所撰专书亦被命名为《蛾术轩篋存善本书目录》。钱钟书《管锥编》书名典出《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不亦小乎?”作者在自序中说:“譬观疏记,识小积多。……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待赓扬。”意指这是一部“识小积多”“锥指管窥”之作。王蒙钟情于引用李商隐诗句。如《心有灵犀》一书书名引自李商隐《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小说《相见时难》暗引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以上各种取名,或庄严美,或典雅美,或含蓄蕴藉美。这些引用千百年来已形成社会习俗文化,而这种习俗文化又促使人们在给各类事物命名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促进,充分利用引用的多个要素,从而表现出给事物命名的多姿多彩,由此也显示了其得以存在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6 文体发展变化推动引用审美的发展变化,文体的多样影响引用审美的多样

文体作为引用修辞手法的载体、平台,它对引用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引用手法存在于文体这一载体、平台之中,它的发展自然受着文体的制约。因此,文体发展变化了,引用手法也会不同程度的随之而发展变化。如以古代散文体为例,“古代散文,就其体制而言,又可分为散体文、骈体文两大类。”^[71]先秦散文主要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两大类。二者“旨在记载历史,发表有关政治、社会等方面主张,原本都是实用性文章。”^[72]其中引圣贤权威的话较多,目的多为“证立言、断行事”,因而其审美以庄严美为主。两汉散文主要继承了先秦散文,也主要有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大类,因而其引用亦继承了以庄严美为主的传统。至唐宋时散文体的引用审美便有了变化,即变为以庄严美、典雅美为主。因为此时散文的范围更加广泛,一般情况下,议论文中的引用多继承以庄严美为主的传统,而传记、游记、抒情等散文

中的引用则以典雅美为主。当古代散文发展过程中,出现骈体文之后,由于魏晋南北朝骈体文“以博雅见长”、“以数典为工”等因素形成了骈体文典雅美的特点,因而骈体文中的引用则呈现以典雅美为主的态势。骈体文引用审美与散文引用审美便有所不同。这说明文体的新变对其引用审美的影响。再以小说体为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代表的《世说新语》,其审美以典雅美为主,故其引用也呈现典雅美为主的形态。到了唐宋时期,传奇以典雅美为主,话本以通俗美为主,二者之中的引用也随之受其制约。明清的白话文小说虽然雅俗共赏,但通俗美成为主流,其引用亦呈现通俗美为主的形态。这也是文体变化对引用审美制约的实例。

从文体的多样来看,在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文体愈多,其引用的审美便愈丰富多样。如先秦时期只有散文与诗歌两种文体,其引用的审美则只有散文中的以庄严美为主与诗歌中的以庄严美兼具虚幻美两大类。到了元明清时期,文体有散文、诗歌、词体、戏曲、小说等多种,其引用的审美也便呈现多样化:既有散文引用的以典雅美、含蓄美为主、诗歌引用的以典雅美、含蓄美为主,清末开始呈现通俗美;又有戏曲引用的通俗美与典雅美相结合,小说引用的以通俗美为主,以及词体引用的典雅美、含蓄美为主等。除以上为主的审美外,还有兼具的其它多元美,如简洁、变化、诙谐等,就更加多姿多彩了。到了现当代,由于语体分得更细,其引用的审美也更为丰富多彩,魅力纷呈。

当然,文体对引用的制约不能机械理解,不同文体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其引用的审美也有共同点。况且引用的审美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并存的;即使审美相同,其引用方式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总之,文体作为引用手法的平台、语境,对引用审美发展的制约是不容忽视的。

7 众多引用理论对审美的推进

数千年来,不断涌现的精辟而又丰富多彩的引用论述,对引用审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7.1 论引用与崇古尊圣

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论及引用的,出自《庄子·寓言》:“重言十七,所以已言者,是为耆艾。”成玄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当时庄子将引用命名为“重言”,主张“以重言为真”,主要是因为权威、长者“体多真实”。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指出:“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政典》为法典,“迟任”为史官。引他们的话,以示权威性。刘勰还引《周易·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作为佐证。并说:“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这些论述,都说明我国向来有崇古尊圣之风。可见引用形成的庄严美,与这些风尚的提倡与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7.2 论引用须适合主旨及各种情境

古往今来与此相关的论述颇多。如《文心雕龙·事类》提出“理得而又要”“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用人若己”等,都围绕用事要自然、合理,切中要点,并融化在自己的语言里。这与“贴切”“密合”等语意殊途同归。唐代王昌龄《诗格》论用事,主张必须“如己意而与事合”,即所用典故要与作者主旨相合。清代袁枚提倡用典要根据诗意的需要而安置在恰当之处。他在《随园诗话·卷六》中说:“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书舍,或宜山斋,不可乱放。他讽刺那些“暴富儿自夸其富,非所宜设而设之,置械箭于大门,设尊壘于卧寝,徒招人笑。”他还认为用典在不同的诗体中也各有所宜:“有宜近体者,有宜古体者,有近古体俱宜者,有近古体俱不宜者”,不能随便乱用。用典要考虑适合各种诗体,这是他的创见。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转引《柳塘词话》引徐士俊论集句有“六难”中,其中一难即“切题意”,沈又加上一难曰“打成一片”,说的也是集句形式要与内容高度融合,他并盛赞朱彝尊集句专著《蕃锦集》是“文心妙合”的“杰构”。以上理论对促进引用自觉地适应题意情境大为有益。

7.3 论求新求雅

宋代用事追求创新之风尚与用事理论的推进关系甚大。王安石提出“借事以相发明”说。苏轼提出“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说,黄庭坚提出“夺胎换骨法”等,均要求在用典时必须发挥创造性,竭力在“化”字上下功夫,灵活熔铸,化故为新,化俗为雅,切忌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他们不仅提出理论,而且身体力行。清代朱弁《风月堂诗话》曾赞曰:“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刘熙载《艺概·词概》赞曰:“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庾语,已经运用,便得风流,

天姿是何复异!”宋吴聿《观林诗话》对苏轼在赠人诗中“多用同姓事”、王安石诗中类似的“用彼我两姓事”的创新之举赞不绝口。名家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了有力地推动作用。

7.4 提倡俗语入诗

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了苏轼的理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融化耳”。这与苏轼“以俗为雅”的论说完全一致。他认为引用民间语言入诗十分必要,但必须对被引俗语、俚语进行熔铸加工,这样可以使语言增添新鲜、自然的魅力,并向“雅”之美转化。明代王骥德《曲律·论用事》主张戏曲用事“务使唱去人人都晓,不须解说”为标准,他对《琵琶记》引用“一夜夫妻百夜恩”等民间习用语,十分赞赏。俞弁《逸老堂诗话》很欣赏白居易诗“善用俚语”。杨慎《升庵诗话》认为“谚语有文理”,主张用谚语入诗。清代袁枚也竭力主张俗语可入诗。这些论述对引用中典雅美、通俗美被认定,都有一定作用。

7.5 赞反用

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从理论上总结出引用中的反用法,指出其特点为“反其意而用之”,并认为“凡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不可能达到此境界。南宋吴沆《环溪诗话》认为“动步要说变了古人言语,方有新意”,“此乃倒翻古人公案”。杨万里《诚斋诗话》重点总结了杜甫、苏轼诗中善用反用法,赞曰:“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指出这是一种翻却古人公案的“翻案法”。清代顾嗣同《寒厅诗话》称赞“韩昌黎诗句句有来历,而能务去陈言者,全在于反用。……学诗者解得此秘,则臭腐化为神奇矣。”这种方法运用得好,能体现化故为新、化俗为雅、化臭腐为神奇,化寻常为高妙的创新精神,从而增添诗的意趣和意境。这方面的理论影响颇大,对引用的新颖美、典雅美的形成,确有一定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古往今来对滥用典故的批评,也从反面警示:典故如滥用,“美”即变成了丑。如:钟嵘《诗品·序》中批评“大明、秦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肖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缉事比类,非对不发,……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的批评,也影响深远。到了现代,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归纳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批判过的引用五“流弊”:用典“隐僻”“拉杂”“浮泛”“刻削成语”“失照管”等,至今还时时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 [2] 肖翠云. 文学修辞批评两种模式及学科思考[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1-58.
- [3] 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M]. 长沙:岳麓书社,2013.
- [4] 李肇星. 胡耀邦和我们谈外交[N]. 报刊文摘,2014-02-17(1).
- [5] 王秀臣. 三礼用诗考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6] 王水照. 宋代文学通论[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 [7] 王运熙. 中国古代散文精粹类编·序言[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责任校对 谢宜辰)